

《五·一六通知》剖析（初稿）

——《五·一六通知》是集中代表“左”倾路线的文件

谭宗级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毋庸讳言，他在晚年也有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纲领路线来看，集中表现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上。

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路线的错误。这场“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带来的只是混乱和灾难。它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内乱，一种自杀行为，自己毁灭自己。指导这场“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集中代表“左”倾路线的文件。它是从1957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继续和恶性发展，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产物。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持续危害十年之久，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对《五·一六通知》的剖析，我分做三个问题来谈：一、《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的历史概况；二、《五·一六通知》是“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三、《五·一六通知》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

（一）《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的历史概况

《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展开，正如毛泽东同志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说的：“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这里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就是指通过《五·一六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此，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1）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

批判剧本《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序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一文的写作和发表，是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准备，由毛泽东同志批准的。事关“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这样严重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竟完全不了解。

吴晗同志（1909——1969年10月11日）是平白无辜的受害者。他原是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发表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剧本，是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而写的。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谈到生产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敢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现在缺少海瑞。一次毛泽东同志在看湘戏《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把《明史·海瑞传》找出来看，接着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说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一场，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讲了以后，还把《明史》给了彭德怀同志看。毛泽东同志又讲，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胡乔木同志把这个意思转给吴晗同志，建议他写些海瑞的文章。吴晗欣然应命，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9月，又写了《海瑞罢官》。时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联系，也素无私人交往。由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恐惧心理，特别在《论海瑞》一文的末尾捎上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划清界限。显然这些题外的话用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吴晗是想为一篇又一篇的海瑞文章避嫌，为自己挖了一条防空壕。继《论海瑞》之后，吴晗还写了《海瑞的故事》等几篇，很受读者好评。京剧《海瑞罢官》是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同志的约请而写的，最初剧名定为《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同志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第四稿才改题为《海瑞罢官》。1961年京剧本发表并演出，受到群众欢迎。以上情况说明，吴晗写《海瑞罢官》完全是凑巧的机会促成的，它和庐山会议、为彭德怀同志翻案等问题毫不相干。

江青批判吴晗，则是有组织、有计划选择的一个反党乱国的突破口。早在1962年，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但是江青并不甘心，1964年下半年，又找人民日报社李希凡同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加以谢绝。1965年初，江青窜到上海，与张春桥拍板成交，非法搞了一个同中央并行的、背着中央的秘密集团，“借用上海攻打北京”。同年八月底，定下以批“退田”联系“翻案风”、“单干风”的主题。为掩人耳目，写出的批判稿都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直送北京江青处，鬼鬼祟祟，约定向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常委中分管文艺的同志封锁消息。文章写成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不在《人民日报》发表，而于1965年11月

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然后观察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否转载。很明显，文章不是作为文化问题、限于一个剧本来进行讨论，而是针对北京市委、针对党中央，作为全局性问题提了出来。姚文出笼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认为姚文元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央并没有通知各地转载，《北京日报》可以不转载。北京市委调查了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证明吴晗历史清白，为保护吴晗作了政治准备。由于北京市报刊十几天不予转载，发难者要出版小册子，以扩大、加强攻势。当时北京新华书店接到上海新华书店一个征求预订的电话，根本没有向北京市委打招呼，北京市委理所当然地置之不理。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并加了按语，这是经周恩来同志修改过的。其中大段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贯彻“双百”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周恩来同志曾对吴晗说：“吴老晗，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发展，这种保护没有得以实现。在江青组织策划下，又接连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载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关锋和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载《红旗》1966年第五期，4月5日出版），把吴晗同志在庐山会议前后写的作品，都同彭德怀同志罢官一事生拉活扯地联系起来。《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突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立即具有“反党”性质。这样，对曾经保护过吴晗的北京市委进行全力打击，就有了突破口。紧接着，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显著地刊载江青化名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同天，《光明日报》也在显著地位刊登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又抛出《评“三家村”》，此文是江青、张春桥直接掌握写成的，从上海发稿，要全国各报刊登，传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差错，以总编辑是问。同天，戚本禹抛出《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这几篇文章交织成一张猛烈的火力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这样，把邓拓、吴晗同志迫害致死，也把彭真同志打倒了，并使北京市委陷于瘫痪。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指出：“《五·一六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一语破的。因此，江青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时，“斗争”目标早已预定，而吴晗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则是康生最先提出来的。1966年2月初，彭真、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同志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同年4月25日和5月5日在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自己也说：“64年的时候，我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6月3日，康生同越南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再一次阐明他的观点：“我曾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他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单干”。江青抓住《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大做文章，完全是由“斗争”目标需要而选定的。江青曾经洋洋得意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

——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十分明显，为了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倒彭真，为了打倒彭真就要从吴晗开刀，这是江青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斗争策略。只要达到这个既定目标，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这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做的一切，也是他们把这个问题写进《五·一六通知》的用意所在。

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江青和林彪相互勾结，由江青出面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林、陈亚丁等进行座谈）。根据这次座谈会整理而成的《纪要》，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种谬论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文艺的重大成就，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把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黑线统治，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关于林彪与江青如何勾结兴妖作怪，另有专题叙述，这里从略）。

（2）打倒彭、罗、陆、杨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扫除障碍。

林彪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由叶群向毛泽东同志诬告罗瑞卿同志“逼林彪让位”、“有篡军反党的野心”。然后中央于1966年4、5月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进行毫无根据的批判。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下，彭、罗、陆、杨四同志被打成“反党集团”。经过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并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宣部长的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不正常关系”。这样彭、罗、陆、杨就被作为“反党集团”打倒了，扫除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这方面的情况，另有专题叙述，这里从略。

（3）《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和发表。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剖析《五·一六通知》，必须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谈起。

1964年5、6月间（确切时间待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了一天会，对批判吴晗同志的情况及继续批判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住院开刀，未参加），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十一人。会议由彭真同志主持。早在这次会议以前，康生就已授意关锋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文章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的。当时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彭真同志也说了查不到吴晗同志与彭德怀同志有什么联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讨论中要坚持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康生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不管怎样，关锋的文章修改后可以发表。许立群、姚溱同志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于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共分六点：第一点讲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任务；第二点讲方针；第三点讲队伍；第四点讲左派要互相帮助；第五点讲准备工作；第六点讲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二月提纲》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其中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的性质和目的，《提纲》指出，从批判《海瑞罢官》、“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为内容的大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方针，《提纲》指出，要“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说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列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他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关于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它规定要“慎重”。关于队伍问题，《提纲》说：“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同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左派要整风的指示，提出了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道路”的警告。如上所述，《二月提纲》除了把学术讨论的性质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显然是“左”的错误而外，其它关于解决学术讨论问题方针、政策的规定，还是比较符合解决学术问题的规律的，这与康生、江青等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枪杀和摧残学术的恶劣行径是截然不同的。总之，《二月提纲》只不过是试图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它类似批判略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而已。

《二月提纲》原是向中央汇报用的。2月3日，彭真同志和康生等先向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大家都同意。2月8日，彭真、康生、吴冷西、胡绳、田家英等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对中宣部搞的有关何明（即关锋）的文章的材料表示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左派的问题以后再说。在汇报中谈及“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毛泽东同志说，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是要在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据说，毛主席宽的精神，对两边都是宽的精神。对吴晗一边，毛泽东同志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同志回答说，他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毛泽东同志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康生后来诡称，《二月提纲》是背着 he 搞出来的。其实，他既参加了事先的讨论，又参加了对中央的两次汇报，并未有任何反对意见。彭真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同志表示，同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同意林彪的“顶峰”和“最高最活”一类提法，要

彭真和康生去上海期间，顺道到苏州同林彪谈一谈。2月12日，彭真、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到上海，把《二月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没有异议。《二月提纲》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过后，于2月12日前作中央文件发到全党，不久即被毛泽东同志指为“修正主义纲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康生到上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中日两党会谈情况，说中日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宫木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修，刘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表示同意了。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毛泽东同志也不接见宫木了。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同志主持的常委不满意，就是苏共二十三大发来邀请信，毛泽东同志未定可否，要在京常委会讨论，常委提出应邀进行斗争的方案。毛泽东同志给予否定，于三月二十四日公布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参看斯诺著《漫长的革命》16—21页）康生在国际问题谈完后，乘机告状，说彭真同志于三月十一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问上海发姚文化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在康生的挑动下，毛泽东同志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毛泽东同志针对彭真、陆定一同志讲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康生于三月底回到北京，即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材料，作为他四月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报告的蓝本。康生传达说，主席说陆定一的中宣部长是阎王殿，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康生的传达，既有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有自己的话，也有他理解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话，混杂不清。根据康生的传达，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宣布《二月提纲》作废。通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同志认为写得太简单，不能用，指示陈伯达主稿，另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陈伯达找王力共同起草，送毛泽东同志修改两次。康生说，光有通知不够，还要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下发。大事记由王力、李鑫起草。后成立文件起草小组（即文革小组的前身），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两个文件就由起草小组执笔，通知以陈伯达为主，大事记以康生为主，实际上都由江青主持。康生说，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吴冷西开脱。王力深知其意，首先是要给康生开脱。王力就在“大事记”里写了一段：“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这完全是为康生开脱的谎言。康生还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讲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话一定要整理上。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对《通知》又修改了两遍，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能接受以批判《二月提纲》为由的《五·一六通知》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以中发〔66〕267号文件下达，同时，按照康生旨意写成的歪曲事实真相的《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也一并下发。这两个文件发至县、团一级党委，起初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

部，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通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五月十五日一夜决定的，说社论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发表《通知》时，毛泽东同志将“彭真同志”中的同志二字删去了。五月十八日发表《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此文由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集体起草，经毛泽东同志审阅修改后发表。“三个阶段”和“里程碑”的提法是王力提出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又发表《伟大的战略措施》一文。直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还发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可见对《通知》是十分重视的。根据《通知》的要求，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撤销了按照《二月提纲》建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另行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和办事机构。

根据《五·一六通知》的要求，五月底，陈伯达率领穆欣、唐平铸等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一举夺了吴冷西的权。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连续五天，每天一篇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并大肆宣扬林彪的那套鼓吹现代迷信的黑货。六月二日刊登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炮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煽动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摧毁党的组织，矛头针对北京市委，在全国掀起把矛头指向各地党委的风潮。六月四日，公布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派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加发一篇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以后隔一两天，就发一篇社论，还转载《解放军报》关于“文化大革命”宣传教育要点。《红旗》社论等，几乎每天都有号召，大造舆论。在极“左”思潮的煽动和反修防修美好词藻的诱惑下，学生和青少年富于革命热情，但盲目性很大，他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自己都很不了解，出于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加上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和其他缺点的不满，希望改革，群起响应，一批所谓“勇敢的闯将”闻风而动，带头兴起了红卫兵运动，他们首先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和党政机关，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恶浪，并很快席卷全国。这样，轰轰烈烈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中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

（二）《五·一六通知》是“左”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

从《五·一六通知》的结构来看，它包括三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罗织《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逐条批驳，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从内容上看,《五·一六通知》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姊妹篇,它把“黑线专政论”推广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雏型。《通知》的问题很多,下面抽出四个方面问题进行剖析、批判。

一、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列宁说:“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列宁全集》二十五卷二六六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列宁全集》二十四卷二三页)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就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严格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愿,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因而我们就能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反之,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量。

《通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它用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口吻,来概括六十年代前期学术领域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在第九条里写道:“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危言耸听,骇人听闻,一笔抹煞了建国十七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成就和主流。它进一步发挥“黑线专政论”,认为“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十三个方面”(即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这些文化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都是“毒草丛生,坏人当道”。这些说法,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和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思潮严重,民主风气不够。在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之后,一方面是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宁左勿右”的思想情绪逐渐滋长,相当普遍。上自主管宣传的领导机关,下到学术文化的各个部门,套框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文艺界批了一些人的作品,哲学界批了杨献珍、冯定同志,经济学界批了孙冶方同志,历史学界批了尚钺同志。批尚钺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批他三个问题——“魏晋封建论”、“唐宋资本主义萌芽”、“明清之际进入近代”,总起来是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给他戴上修正主义、托派观点的大帽子。当然,尚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毕竟是学术问题,不能因为苏联史学界有类似观点,就给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对错误观点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扣帽子,打棍子,毕竟不是对待学术争论和进行

理论斗争的正当手段。

学术界、文化界的这种情况，到六一年传达周恩来、陈毅同志在广州讲话和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才有所缓和。但为时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还讲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番话。紧接着，一九六三至六四年写“九评”，批苏修。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文化领域的“左”倾思潮又普遍高涨了，错误地批判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打击了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并且往往硬说他们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对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政治诬陷。例如，诬陷李建彤同志写的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就是典型的事例。到一九六五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批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后，特别是报上一再点了吴晗、翦伯赞同志的名之后，情况那就不同了，那就不是什么学术问题，理论批评了，这种政治诬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坚决拥护党的主张，痛恨国民党的卖国独裁统治，在党领导下，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深受进步青年和学生的爱戴。一九四八年秋，他积极响应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逃出国统区，奔赴解放区。解放后，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在党的长期教育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锻炼和考验，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象吴晗这样长期和党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竟被扣上“反党”、“反共”的大帽子，难怪翦伯赞同志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翦伯赞同志是早在抗日战争前入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时他的学术观点也被升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说同他的争论“不是一般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了。《通知》下达后，什么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统统被取消了。从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三反分子”的帽子满天飞，陷人于罪的棍子到处打，大兴文字狱，祸患无穷。

《通知》不但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的错误估计和判断，而且对六十年代中期的整个党内和国内形势也作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和判断。最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就是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倒数第二段）而且还认为，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个别的”、“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不是个别部门、个别地区有这样的人物，而是“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一段）把敌情估计得十分严重，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篡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且渗透党、政、军、民各部门，遍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真是达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连我们党直接掌握和依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也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揪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提供了理论依据）。照此说来，我们党我们国家已经是“阴霾满天”，“危机四伏”；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面临着“赫鲁晓夫上台”的现实危险了！这是一幅把现实歪曲的多么可怕的阴森恐怖的图画！

正是根据这样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只能说是从文化界开刀，打开缺口），而被称为“一场政治大革命”。什么叫“政治革命”？即《通知》指出的，“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结语，倒数第三段）即“夺权”。列宁说过：“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三卷一三页）

《通知》就是从“夺权”这个意义上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于当时是不是出现了上面所讲的那种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不是面临着重大威胁，以至于我们必须发动这样一场“政治大革命”？六十年代中期发动这场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

现在看得很清楚，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危机。相反，那时由于三年困难迅速得到克服，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是信服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信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巩固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客观形势的要求是：进一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说，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党把全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力以赴，为高度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落后面貌而奋斗。这是六十年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换句话说，当时并不存在政治革命的形势。列宁多次讲过，只有到了“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上层”也不能照旧统治和管理下去的时候，才出现革命形势。很明显，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并未出现那样的局面。即使存在某些残余形态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存在改革上层建筑、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也不需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客观形势并未提出这样的任务。因此，这场运动的发动，使全党全国人民感到非常突然，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说到底，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人为地发动起来的。而实践证明，这样做是违反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打乱了历史的正常进程，必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其结果导致了混乱和倒退，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和破坏，导致了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几乎亡党亡国。但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把党的工作着重点逐步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使我国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是付了何等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啊。

一、根本颠倒敌我关系，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即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列宁说：“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

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宁全集》二十五卷二四五页）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分清敌我的重要性，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恰恰在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犯了根本错误。《通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主观臆断，因而夸大敌情，根本颠倒敌我关系，误把广大干部视为“走资派”，把广大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号召对他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统统打倒。

这场“大革命”的对象，完全是人为的制造出来的，是以对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状况所作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主观臆断为基础的。首先，“党内走资派”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臆造的假想。在我们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即当权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虽然党内也混进了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但在党内没有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究竟指什么人，从提出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无确定的标准，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时一个人竟可以昨天是“走资派”，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又是“走资派”，全看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几个核心人物的“态度”如何。这一提法最初见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发布的《二十三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概念来规定运动对象，是很不严密、很不妥当的，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出一条“左”倾路线。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难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一九六三年农村社教运动开始时，要解放的是一部分农村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即在经济上反对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在政治上反对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对地富“斗争不力”，与地富“划不清界线”等；在组织上反对队伍不纯；在思想上反对损公肥私等等。有个别蜕化变质的，本来就有固有的名称，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嘛。为什么说他是“走资派”呢？不确切。又比如贪污分子，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贪污在任何社会都是犯法的，不容许的，把他说成是“走资派”怎么解释得通！因此，“走资派”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引起制造混乱。那时，主要整的还是农村基层干部，如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公社主任、书记等。《通知》和《十六条》仍继续沿用这一提法。“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扩大到上起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支部书记、甚至汽车组长、炊事组长，都可以成为夺权的对象。因为“走资派”的概念内涵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如炊事组长，掌握瓢勺把子），就是“当权派”，就可被打成“走资派”。一点小错误都可以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都是搞社会主义的，但因持有不同意见，我这一套是社会主义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逻辑，你只要在工作中说过一句同《毛主席语录》有点不同的话，犯过一点错误，都可以被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几百万多“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定又不科学的概念，林彪、“四人帮”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顾名思义，一定是属于右的性质，单提反对资本主义，就是

只许反右，不许反“左”，结果只能是“左”了还要“左”，以“左”反右，越反越“左”。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大搞“普遍罢官”，“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绝不是偶然的。等到“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起来了，再往回收，说“对走资派要做具体分析，不要认为走资派都是坏人，犯走资派错误的也有好人”。可是，混乱之势已成，严重的后果已难挽回。

用“整”这个动词来指阶级斗争的方式，必然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无视党纪国法，草菅人命的恶果。虽然解放后我们搞过整风，整社运动，但那是对人而不是对事，又当别论。社教运动开始时，虽然也说过对干部要洗“温水澡”，但一提出“整”之后，在多数单位把干部几乎全部赶上了“楼”，而且很难“下来”。到“文革”时，这个“整”字就发展到淋漓尽致了：什么“炮轰”、“火烧”、“油炸”、“砸烂狗头”之类全出笼了。林彪、“四人帮”狂叫的“要把他们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正是从“整”字引伸出来的吗？

总之，“走资派”是个不科学的概念。“走资本主义道路”涵义不明确，“当权派”所指又非常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分不清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给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大开“整人”之门，用来无限上纲，打倒一切。“文革”期间，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如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后补委员三十三人，除去世三人外，遭诬受害的二十三人，为总数的76.6%；中央书记处十七人，遭诬受害的十四人，占总数的82.4%；军委副主席七人，遭诬害的六人，占总数的85.7%；三届人大常委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是中委的十人，遭诬害的七人，占总数的70%；国务院副总理十五人遭诬害的十三人，占总数的86.7%；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六人，除一人去世外，遭诬的有四人，占总数的80%；八届中委、后补中委一百九十四人，除有病、死亡的三十一名外，遭诬陷靠边站的九十六人，占总数的58.9%。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革”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冤狱遍于国中，遭诬受害致死致残的干部不可胜数。在“文革”期间，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的几乎到处都是。经过平反以后，究竟还有谁定为“走资派”呢？即使是林彪、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四人帮”，在对他们定性论罪的时候，也未使用这一概念。实践证明，“走资派”并非“科学的抽象”，完全是臆造的假想，应当坚决抛弃它。

《通知》第九条提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结语又提出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以后，《十六条》规定要斗争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概念也是不科学的。“反动”指什么？按照前一种提法，可以理解为学术思想上的反动；按照后一提法，可以理解为政治立场上的反动。如指政治上的反动，那就批判他政治上的问题就是了，与学术思想无关。如指学术思想，而在政治上不是反动的，则根本用不着“反击”、“彻底揭露”。例如，一些相信唯心论的学者，宗教界人士，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党，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怎么能够去“反击”呢？学术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讨论的方法来解决，怎么能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消灭唯心论的学术思想呢？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在“文革”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把旧社会过来的一些知名的专家、作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有成就的

同志，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不能幸免。文艺界人士大批被迫害。仅文化部直属单位受害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多人。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老舍、周信芳、马丁、潘天寿等九十多人被害死；据十七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教育界的干部、教师受害的142607人，致死的7682人；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七机部两个研究院和十七个省市，共有53155名科技人员遭迫害。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⁴绪沛、昆虫学家刘束承、理论物理学家张家燧等被折磨而死。仅卫生部直属十四所高等医药院校，共有教授、副教授六百七十四人，受害的五百五十六人，其中致死的三十六人。奇怪的是，也有在政治上、学术思想上都反动的所谓“学者”，如冯友兰、赵纪彬之流，却成了“四人帮”的“座上客”、“此门学士”，成了“梁效”写作班子的“师爷”。原因在于他有一套反动的政治手腕，善于看风驶舵，会拍“老娘”的“马屁”，搞什么“百鸟朝凤”，当然会得到“女皇”的“青睐”，因而“反动”立即变成“革命”了。由此可见，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是应当抛弃的不科学的概念。

总之，由于革命对象不清，没有搞清楚究竟有没有敌人，究竟是不是敌人，没有搞清楚敌我双方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就宣布敌情异常严重，危在旦夕，就发动一场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其后果必然造成这场“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对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其他阶层人民进行诬陷迫害的大冤案。

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规定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①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提出无产阶级的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错误方针。

《通知》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把政治问题设为禁区，不准讨论，讨论了就是犯罪。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当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无论如何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通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为理由，来抹煞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应当怎样理解“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列宁解释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解释：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列宁全集》四卷191至192页）由此可知，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非一开始就是政治斗争，而只有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自觉地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这种斗争才是政治斗争。同时，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斗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斗争，在思想领域表现为思想斗争。虽然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有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但都不等于说经济斗争、思想斗争就是政治斗争，都应该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总之，无论从阶级斗争发展的各个阶段来看，还是从阶级斗争在各个领域里各有不同表现形态来看，都不能把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因此，《通知》借口这个命题而不准提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于把政治问题列为禁区，不准讨论，更加没有道理。如果政治问题不准讨论，只能奉命行事，试问，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政治民主可言呢？！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

一谈，但两者确实联系很紧密。任何政治问题（包括路线、方针、政策等）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的；而任何学术、理论问题都会对实践产生政治影响。这种情况表明，如把政治列为禁区不准讨论，那么，学术、理论问题也就很难深入地展开讨论。因为一深入开展，势必涉及禁区。这样，学术、理论问题还怎么讨论呢？

《通知》认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第二条）很明显，《通知》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学术讨论、理论探讨，武断地认为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把学术理论领域的争论简单化归结为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把“百家争鸣”说成实际上是“两家争鸣”，既取消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重任务，也忽视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这样逻辑的必然结论是：我是无产阶级，你反对我的观点，跟我的看法不一致，那你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通知》全文都贯串着这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口吻。这是完全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

《通知》提出无产阶级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这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对待文化历史的理论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如对法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列宁、斯大林专门批判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批判过所谓要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口号。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一九二〇年十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出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选集》四卷三四七页）过了几天，列宁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草案中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四卷三六二页）斯大林说：“有个时候，在我国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由此他们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斯大林选集》下册五三一页）毛泽东同志早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总结，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继承下来。（《毛泽东选集》二卷四九六页）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通知》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请问怎样消灭呢？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表演，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凡是不符合他们帮派口味的东西，管它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律贬斥为“封、资、修”加以封禁、销毁（甚至付之一炬，如砸孔碑、挖孔坟、砸孔庙），对这些作品的作者一律予以打倒（甚至投进监狱，从肉体上消灭），造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

斯淫威统治下，连郭老也违心地宣布要把自己的著作统统烧掉！这个方针，说穿了，就是要消灭同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方针，是毁灭文化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的结果是：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如恶风卷地，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越演越烈。“黑线专政论”肆虐横行，文化专制主义毒雾滚滚。国力衰惫，民气戕伤，真是一场浩劫和灾难。

②鼓吹“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

《通知》第四条提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所谓上层建筑，就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斯大林选》五二〇页）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简单地说，即政治和文化。《通知》说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也就是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政。什么是专政呢？专政是指掌握政治的统治阶级凭借暴力手段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镇压。列宁说：“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三卷八三五页）“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把专政手段移用到思想文化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在这里，任何粗暴的作法，不但与事实无补，而且只能把事搞糟。因为一定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只能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实现。因此，企图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强制解决某种思想文化问题，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某种观点、某部作品，某一出戏，某个电影，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常常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作阶级敌人，革命对象，而对他们实行所谓专政，后果极其严重。以后“四人帮”提出的所谓“在思想领域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专政”，“把文化部办成意识形态里的公安部”，以及所谓“全面专政论”，其源盖出于此。这种提法，就是前面讲过的，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观点歪曲引用的必然结果。“四人帮”故意抹煞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原则区别，在他们看来，似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敌我斗争，因而无一例外地要统统实行所谓专政。

（3）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鼓吹真理的阶级性。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命题表明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都有权探索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而不管谁掌握了真理，人们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即尊重真理、服从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掌握了真理，包括掌握了部分真理的人，从来都是采取尊重、学习的态度的。这就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尽管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学者，

马、恩照样是尊重、肯定他们的，并不因人废言，照样吸收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分，用来建立和证实自己的学说。马、恩对待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欧文、傅立叶的态度，就是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分才创立起来的。

同样，列宁并没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后期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否定他前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也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不要跟一个人，要跟真理，谁发现了真理，就服从谁，管他是挑大粪的，还是干别的什么的。

以上说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通知》却把这一观点诬蔑为“资产阶级口号”，它根据什么呢？

《通知》认为，这个观点否认了真理的阶级性。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是客观的这一论断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就其形式来说虽然是主观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客观的。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因此，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承认真理有阶级性，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客观性的观点。试问：如果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真理的话，那就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什么客观真理可言？《通知》提出真理阶级性的命题，完全是武断的谬论（这方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再赘述）。用这个错误的命题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恰好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通知》往下的批判，根本不顾形式逻辑的原则，把在真理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原则，一下偷换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第四条）试问，这些问题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是一个问题呢！例如，象清除林彪、“四人帮”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问题，怎么会是一个问题呢！这种偷换论题的“批判”法，除了证明自己无理而又武断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宣扬和推行了封建法西斯的权力真理论，助长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人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在真理面前的依附关系、等级关系，只有某些人或某个人有权力有资格掌握真理，其他的人只有等待这些人的恩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辉。而掌握真理的人，又一定是伟大的天才。这种人地位越高，真理就越多。地位达到高，他也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这种真理化身的人的言论，只能成为信仰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别人无权研究，顶多只能注释。谁如果想搞点平等，探讨、研究这些言论是否正确，横祸就会从天而降。十七世纪荷兰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圣经应和其

他文件一样，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为亵渎神圣，大逆不道，被开除教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异议，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竟遭杀身之祸。类似张志新同志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有识之士还不乏其人。这种理论上的专制主义，在“文革”中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突出的是《公安六条》中规定的“恶毒攻击”罪。许多冤案都由此而来。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权力真理观并未绝迹。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实际上还是坚持权力真理论。在他们看来，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写的，都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终极真理。同样一个错误观点，只要是毛泽东同志说了，错误就变成正确；同样一个正确观点，被所谓犯错误的人一讲，正确的也变成了错误。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4）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鼓吹以“破”代“立”。

必须全面理解破和立的辩证关系。破，是对旧事物的批判和否定；立，是新事物的产生、成长和发展。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二卷六六六页）破和立这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决不是说，破等于立。我们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夺得了政权，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因此就自行成长起来，必须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建设和工作，才能建立起来。把破和立等同起来，以破代替立，象“四人帮”说的，“抓了革命，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是错误的、反动的。破并不是目的。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被打碎的旧社会的废墟，而是为了在这个废墟上建立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破，是为立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立，才是目的。破的任务是艰巨的，立的任务往往更艰苦更困难，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更长的时间。把破当成目的，说破就是一切，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态度。

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破无疑是中心的任务，应当破字当头。但是，当革命夺取政权以后，破的任务虽远未完成，立的任务却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我们提出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表明我们已把“立”提到首要地位，也可说是立字当头。这是辩证法，不能说任何时候都应当是“破字当头”。老是破，不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怎么谈得上“立”？应当说没有破，是不可能立的。但是没有立，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破。如果我们不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它建设好，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破除掉的。因此《二月提纲》说的“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并没有错，而《通知》竟不问青红皂白，批判这句话是：“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无限上纲，一连扣了许多大帽子，不讲道理，它自身才是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破的绝对化，推行“破就是一切，破就是立”的“捣乱哲学”大开方便之门。

四、在组织上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设立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发号施令，主宰一切。

为了贯彻执行《通知》提出的这样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通

知》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实际上是一次夺权。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原有的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于1966年5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名单主要是江青提出的。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1966年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文革顾问，名列康生之前），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七人，以后还补充了四个大区的同志，即郭影秋同志（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代表华北局）郑厚翘同志（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东北局），杨植霖同志（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局）刘文珍同志（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总共十八人。其中郭影秋、郑厚翘、杨植霖、刘文珍四同志，只是在文革的初期出席过几次讨论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件的会议，工作岗位仍在原单位，并未到中央文革担任实际工作。因此，中央文革成员名义上是十八人，实际工作的只有十四人。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事和职权有过很大变化。起初，即从1966年5月至12月，中央日常工作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由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十一中全会后，由周恩来、陶铸同志负责），文革成员列席参加，起参谋助手作用（江青曾说“文革小组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由于陶铸、王任重同志等在文革小组中抵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胡作非为，成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障碍，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1967年1月初将陶铸、王任重同志打倒（还有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等同志也先后被打倒）。这样，中央书记处完全停止活动。接着林彪、江青等人又借“反击二月逆流”为名，把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同志（其中副总理五人，军委副主席四人，七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四人是书记处书记，李富春是常委，国务院业务组长，都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老同志）打下去，靠边站，迫使中央政治局完全停止活动。从此，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夺取了处理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他们在一人之下，全党之上，发号施令，主宰一切。中央文革公然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布指示，开创了踢开政治局闹革命的最恶劣的先例。而文革小组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组成，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列席，和林彪同伙，都是一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也有这些人参加。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碰头会都有周恩来同志参加。他在这两个会内部，坚持原则，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保护一些老干部、名流、专家、学者，才为我们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尽管周恩来同志挺身而出，力挽危局，但毕竟处境困难，孤掌难鸣，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本扭转形势，纠正方向、路线的错误。用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代替政治局，彻底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践踏了党章。在我党历史上，王明篡夺党的领导，还是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实现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不能得逞。而这个文革小组完全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撇在一边，假借“最新最高指示”，直接号令“造反派”揪斗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甚至任意宣布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为“大

叛徒”、“最大走资派”，等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它早已夺取了中央的领导大权。直到九大开会，在主席台上，文革小组成员及其列席者坐在前排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右边。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把文革成员和列席者列在前面，政治局委员排在后面。人们一望而知，这次代表大会是由文革小组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集的，党章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实践证明，中央文革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通过种种阴谋，居于一人之下，全党之上，利用篡夺得来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依靠所谓“造反派”实行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局长，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把许多老干部打倒，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局长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反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它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建设，决不能让坏人来篡夺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们从形势、政治、理论、组织四个方面对《通知》进行了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漆黑一团，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由于对形势分析的错误，因而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把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革命对象，即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在理论上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全盘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否定对历史遗产要批判继承的原则，提出所谓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在组织上，建立由江青五人一手控制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文革小组，君临全党全国，主宰一切。由于它已“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五〇页），是“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因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就标志着“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经常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革命思想作斗争，不断地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压迫人民、蜕化变质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个长期的严肃的任务，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课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大量的和必然长期存在的），而决不可以主观臆断，以致颠倒敌我，混淆是非，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而决不可以抛开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而决不可以破坏民主和法制。总之，决不可采用《通知》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方法。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惨重牺牲得来的历史经验，我们一定要永志不忘。

三、《五·一六通知》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具体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既然经过实践检验，造成十年动乱、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了；那末，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表现的“继续革命理论”，也应该予以全盘否定，彻底清算。这里，不对“继续革命理论”展开全面批判，只就《五·一六通知》与“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在联系谈一点看法。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左”倾思潮更加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矛盾日益尖锐复杂。而这一切，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又恰好证明他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的正确，因而就更加急切地想要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斗争来揭露和解决这些矛盾。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时说：“过去我们搞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九大报告）毛泽东同志究竟把什么看作我们的“黑暗面”，又为什么非要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不可呢？这个答案就在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通知》中。

《通知》的基本精神是什么？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作了以下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进党和政权领导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段文字概述了毛泽东同志亲笔加到《通知》中的三段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一段）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

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结语两段）

这点十分清楚，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黑暗面”，就是指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就是党内“走资派”。既然人数这样多，分布面这样宽广，危险性又这样严重，那末，任何局部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非要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不可。总之，“文化大革命”是非搞不可了。《五·一六通知》正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制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通知》的基本精神、中心思想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向党内“走资派夺权”。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主稿写成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把“继续革命理论”归结为六条要点。除了其中第一点是属于“务虚”，即应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问题这一点外，从第二点到第六点说的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那里首次从几个长期“存在”讲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革命的必要性，进而把问题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治问题”，引到上层建筑领域“全面专政”。那末，向谁“夺权”呢！第四条的回答是：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接着第五条规定的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夺权。最后，第六条讲的是“斗私、批修”的根本纲领，归结到挖“修正主义根子”，即落脚到改革一切“不适合”的“上层建筑”。很明显，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情况下，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搞政治大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动力是所谓“造反派”，任务是“全面专政”，即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总之，“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夺权”。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著名论断，即“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1页）然后加以发挥，说今天“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把“继续革命理论”抬到吓人的高度。还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里程碑。这样，就把当时反对和怀疑这个理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统统贬斥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时，还把我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提法改变了，而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标志，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这一“新发展”，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一切。

以上说明，从“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通知》和它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产物；从基本内容来看，两者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说，《通知》奠定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继续革命理论”是《通知》中阐述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通知》的发表，是一代人灾难的开始。如果说，在这以前，“左”倾思潮还未系统化的话，那末，《通知》的制定和通过，就标志着在我们党内不但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而且标志着这条路线

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进行的。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通知》指引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呢？

“文化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一个进步阶级推翻一个反动阶级的统治，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取代一种反动或落后的生产关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立以后，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和完善，我们还要正确处理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些都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任务，但是，这种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与阶级对抗社会中的革命。无视社会历史条件的这种根本变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继续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就必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如果说所谓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始终存在并作为主要矛盾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础，那不过是一种想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基础。接受那种脱离现实的假定，必然导致可以用思想划分阶级，可以在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等，毫无社会科学常识的奇谈怪论。而且，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消灭阶级，而是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还要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如果共产党内还要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即“走资派”，如果每隔若干年就要进行一次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去推翻新的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政权，如果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和长期循环反复的，那就势必是人们认为，用社会主义制度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竟会更为残酷和使人痛苦。这一切当然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完全失败是必然的，它对党、对人民和国家只能造成令人痛心的大破坏是必然的。

恩格斯说得好：“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恩全集》第四卷458页）列宁说：“革命是要靠试验和实践才能领会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476页）十年浩劫，教训深刻。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和受害者，回顾以往，记忆犹新，痛定思痛，感触很多。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通知》，仔细剖析，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